

# 中国新型城镇化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障碍诊断及驱动因素

吕宛青, 宋志高, 肖钊富

(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 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 探究新型城镇化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关系对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在厘清新型城镇化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机理基础上, 基于2014—2023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 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障碍度模型与地理探测器分析了二者耦合协调关系时空演变特征、障碍因子及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 (1) 2014—2023年新型城镇化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增长态势明显, 且2014—2019年演进轨迹具有较高一致性。(2) 两系统耦合协调度波动上升, 但区域差异较大, 具体表现为“东部沿海→中西部内陆”梯度递减。(3) 障碍因子中, 经济城镇化与旅游创新发展分别构成新型城镇化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系统中首要准则层障碍, 指标层的人均GDP和旅游学生数量为核心障碍因子。(4) 驱动因素中, 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干预能力对其耦合协调度解释力最强, 科技创新水平相对有限。

**关键词:** 新型城镇化; 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耦合协调; 障碍度模型; 地理探测器

**文章编号:** 1000-6060(2026)05-1063-11(1063~1073)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国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 为稳步提升城镇化水平和质量, 构建新发展格局,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劲动力。作为国家战略支柱产业之一, 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在消解城乡壁垒、改善民生福祉、推进生态保护等多方面成效显著, 已成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质增效的核心引擎, 受到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为进一步深化新型城镇化与旅游业高质量协同发展, 国务院陆续印发了《“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等一系列纲领性文件, 明确融合发展的实践方向。因此, 揭示新型城镇化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机理、演化规律和驱动机制, 对于探索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回溯新型城镇化与旅游业互动关系研究, 学界

主要聚焦以下3方面展开探讨: (1) 动力机制。一方面, 学者普遍认为旅游业发展能够助力新型城镇化建设。如李志飞、蔡刚等<sup>[1-3]</sup>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 系统阐释了旅游业凭借产业联动、要素流动和就业带动等优势推进新型城镇化纵深发展; 另一方面, 新型城镇化为旅游业发展构建起涵盖市场环境、资源配置和公共服务支撑体系, 驱动旅游产业链延伸与价值重构, 提升了旅游经济效益<sup>[4]</sup>、产业效率<sup>[5]</sup>以及生态可持续性<sup>[6]</sup>, 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创造了优越条件。(2) 协调关系。新型城镇化与旅游业发展在内在逻辑和目标导向上高度契合, 二者存在明显耦合协调关系<sup>[7]</sup>。国内外学者采用耦合协调模型, 针对全国<sup>[8]</sup>、经济带<sup>[9]</sup>、城市群<sup>[10-11]</sup>、自然流域<sup>[5]</sup>等多尺度展开量化研究, 并指出其驱动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基础、科技创新、人力资本、对外开放、政策规制、交通条件等<sup>[3,11-13]</sup>。(3) 影响效应。新型城

收稿日期: 2025-05-06; 修订日期: 2025-10-1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24XMZ034); 云南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KC-242410097)资助

作者简介: 吕宛青(1962-), 女, 博士, 教授, 主要从事民族旅游与旅游经济研究。E-mail: lvwq@ynu.edu.cn

通讯作者: 宋志高(2001-), 男, 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旅游经济与旅游地理研究。E-mail: songzhigao@stu.ynu.edu.cn

镇化与旅游业融合发展对区域经济社会产生深远影响。“城旅协同”相较于“城旅独立”发展更有助于在地文化保护与传承<sup>[14]</sup>、城乡融合发展<sup>[15-16]</sup>和经济增长质量提升<sup>[17-18]</sup>。然而,地区发展中若出现过度旅游化倾向易诱发城镇空间功能失衡与资源错配,对区域可持续发展形成制约<sup>[19]</sup>。

纵观现有文献,新型城镇化与旅游业互动关系研究较为丰富,但从高质量发展视角对二者耦合协调关系及其内在机理缺乏深入探讨,在耦合协调动态演进规律和区域差异影响机制方面的实证辨析尚显薄弱,不利于为新型城镇化与旅游业提质融合以及“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提供理论支撑与决策参考,亟需面向高质量发展实际开展系统性考量和针对性研判。鉴于此,本文在厘清新型城镇化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机理基础上,基于2014—2023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探究两者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分异格局,并借助障碍度模型和地理探测器识别关键内外部影响因素,以期为推动我国新型城镇化与旅游业高质量协同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 1 数据与方法

### 1.1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4—2023年中国31个省域面板数

据(港澳台数据暂缺)进行分析,涉及数据均源自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交通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中国文化文物和旅游统计年鉴》等官方统计年鉴及官网权威数据,并对经济类数据进行不变价处理。部分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补充。

### 1.2 理论分析

新型城镇化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环境,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为新型城镇化注入发展动能,两大系统在演进过程中相互促进(图1)。

新型城镇化驱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1) 随着城镇产业结构优化、居民生活水平提高,旅游消费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旅游产品体系完善、业态迭代和服务质量提升,以匹配游客日益增长的高品质、多元化需求<sup>[8]</sup>。此外,物质财富累积和政府财政收入增加引导资本由高污染、高能耗产业向旅游类环境友好型产业流动<sup>[6]</sup>。(2) 新型城镇化着力推进空间载体功能优化,增强公共服务效能和可及性,为降低旅游交易成本,提高旅游效率提供支持的同时,也为旅游空间场景多样化、合理化提供了充足运营空间<sup>[3,9]</sup>。(3) 社会城镇化水平提高意味着社会结构与关系、消费观念、生活方式变迁,创造了旅游消费新需求,引入了高素质人才,以此推动旅游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向创新主导加速转变。(4) 人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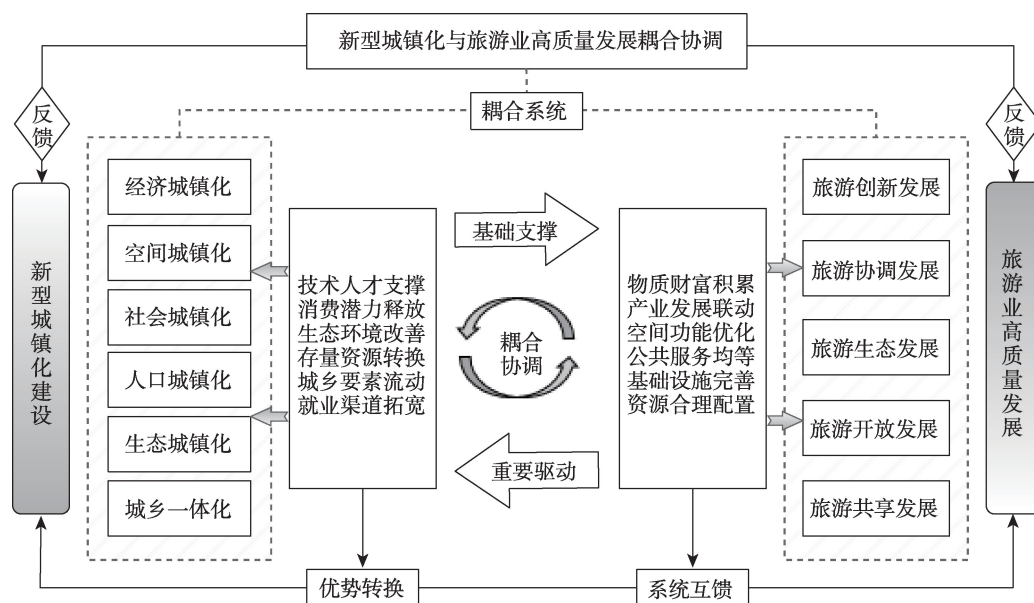


图1 新型城镇化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机理

Fig. 1 Coupling coordination mechanism between new urbaniza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ourism

城镇化所产生的人口聚集效应一方面为旅游业提供专业人力资本储备,另一方面也形成庞大的旅游消费市场,共同提升了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sup>[17,20]</sup>。(5)生态城镇化发展理念推动城镇经济绿色转型,为旅游类典型绿色产业创造了广阔发展空间<sup>[6,13]</sup>。与此同时,生态城镇化强调绿色导向,引导旅游产业向可持续范式演进。(6)新型城镇化注重城乡统筹发展,强化了城乡生产要素流动性,扩大了旅游经济规模,进而优化产业资源配置效率与供需结构适配性,推动旅游发展红利向更广泛社会群体渗透<sup>[21]</sup>。

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赋能新型城镇化。(1)旅游创新发展进程中所涌现的大量高素质人才和新兴科技催生新业态及经济形态,并通过强化产业支撑、重塑空间价值和塑造城镇魅力实现城镇化模式由外延式扩张向内涵式提升转变<sup>[8,22]</sup>。(2)旅游发展呈现多元化、动态化演进趋势,与餐饮、交通、文娱及住宿等关联产业的深度融合驱动城镇经济结构性变革,并借由全链条资源整合与价值网络重组,为区域综合竞争力提升注入动能,实现经济增效与产业增值的协调发展<sup>[9]</sup>。(3)旅游绿色发展秉持“低能耗、高产出”理念,致力于提升生态效益,这直接推动了生态城镇化建设,助力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增强生态公共服务能力,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美丽城镇<sup>[20]</sup>。(4)旅游开放发展有效拓展了消费市场规模,推动跨境文旅投资,如实施入境免签政策、中老铁路旅游带建设,促进了城镇消费升级与产业结构优化的同时,也推动了城镇治理现代化进程,加速了开放型城镇制度体系的构建。(5)旅游产业属性加速了地方资源优势产业化进程,构建起城乡要素跨区域流通和一体化发展的空间动力机制。此外,旅游业通过革新城镇化中的要素配置机制,有效应对了农业转移人口就业吸纳乏力与市民化进程迟滞等结构性难题,拓宽了地方居民的就业与增收途径<sup>[21,23]</sup>。

### 1.3 指标体系构建

为客观、系统评估我国新型城镇化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状况,本文遵循科学性与可获取性原则,借鉴已有文献<sup>[8,11,24-25]</sup>,从经济、空间、社会、人口、生态、城乡一体化6个维度构建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将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界定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5个维度(表1)。

## 1.4 研究方法

**1.4.1 熵值法** 熵值法能够有效避免主观赋权法的偏差,客观真实地反映指标数据所传达的信息,适用于测算新型城镇化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系统指标权重系数,并通过加权法得出二者综合发展指数<sup>[9]</sup>。

**1.4.2 耦合协调模型** 通过耦合协调模型量化新型城镇化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水平,具体方法可参见文献(表2)<sup>[8]</sup>。

**1.4.3 障碍度模型** 为了探明主要障碍因子对耦合协调度的影响程度,引入障碍度模型<sup>[9]</sup>。

$$h_{ij} = \frac{(1 - D_{ij})e_j}{\sum_{j=1}^n (1 - D_{ij})e_j} \quad (1)$$

式中:  $h_{ij}$  为第  $i$  年第  $j$  个指标的障碍度;  $D_{ij}$  为第  $i$  年第  $j$  个指标数据的指标偏离度;  $e_j$  为第  $j$  个指标的因子贡献度;  $n$  为指标总数。

**1.4.4 地理探测器** 通过地理探测器分析新型城镇化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两大系统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结构形态的外部影响因素及其解释力大小<sup>[26]</sup>。

$$q = 1 - \frac{1}{N\sigma^2} \sum_{i=1}^L N_i \sigma_i^2 \quad (2)$$

式中:  $q$  为影响因素解释力度;  $N$  和  $N_i$  为整体和层  $i$  影响因素的单元数;  $\sigma^2$  和  $\sigma_i^2$  分别为整体和层  $i$  影响因素的方差;  $L$  为分层数。

## 2 结果与分析

### 2.1 新型城镇化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

2014—2023年我国新型城镇化水平总体呈现平稳上升态势,但地区间发展仍存在明显差异(图2)。从区域来看,东部地区全国新型城镇化水平持续高于我国其他地区,中西部地区同样稳步提升,而2015—2020年东北地区增速有所放缓。全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现“单峰单谷”变化特征,具体可划分为3个阶段:2014—2019年上升期、2020—2022年停滞期、2023年恢复期。从区域来看,东部地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始终保持领先地位,而2016年以来东北地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逐步超越中部地区。总体来看,我国新型城镇化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部分时期呈现非对称耦合特征,前者高于后者,但在时空演进中保持动态协同关系。鉴于旅游业对外源性扰动的高敏感性,在面临政策调



表1 新型城镇化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Tab.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new urbaniza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ourism

系统层	准则层	指标层	指标说明	属性
新型城镇化	经济城镇化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X_1$ )/元	城镇居民人均可用于日常生活开支的收入	+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X_2$ )/元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常住人口数量	+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 $X_3$ )/%	第三产业增加值/GDP	+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X_4$ )/元	GDP/常住人口数量	+
	空间城镇化	人均城市道路面积( $X_5$ )/m <sup>2</sup>	城市道路面积/常住人口数量	+
		人均拥有建成区面积( $X_6$ )/m <sup>2</sup>	建成区面积/常住人口数量	+
		建成区面积占比( $X_7$ )/%	建成区面积/城区面积	+
		公共交通工具普及率( $X_8$ )/辆	每万人拥有公共汽车数量	+
	社会城镇化	教育投入占比( $X_9$ )/%	地方财政教育支出/GDP	+
		医疗卫生水平( $X_{10}$ )/张	每万人拥有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	+
		教育规模( $X_{11}$ )/人	每十万人高等学校在校生数	+
		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量( $X_{12}$ )/册	公共图书馆藏数量/常住人口数量	+
	人口城镇化	人口城镇化率( $X_{13}$ )/%	城镇人口数量/常住人口数量	+
		城镇人口密度( $X_{14}$ )/人·km <sup>-2</sup>	城镇人口数量/城镇建成区面积	+
		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比( $X_{15}$ )/%	第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总从业人员	+
		城镇就业情况( $X_{16}$ )/%	城镇人口登记失业率	-
	生态城镇化	每万人拥有公共厕所( $X_{17}$ )/座	每万人拥有公共厕所数量	+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X_{18}$ )/m <sup>2</sup>	公园绿地总面积/常住人口数量	+
		污水处理率( $X_{19}$ )/%	污水处理量/污水排放总量	+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X_{20}$ )/%	无害化城镇垃圾处理量/生活垃圾产生总量	+
	城乡一体化	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比( $X_{21}$ )/%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
		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比( $X_{22}$ )/%	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乡村居民人均收入	-
		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比( $X_{23}$ )/%	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乡村居民恩格尔系数	+
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创新发展	人均旅游R&D经费支出( $X_{24}$ )/元	旅游R&D经费支出/常住人口数量	+
		旅游发明专利( $X_{25}$ )/个	每万人旅游相关发明专利授权数量	+
		旅游学生数量( $X_{26}$ )/人	每万人高等和中等职业旅游院校在校人数	+
		旅游劳动生产率( $X_{27}$ )/10 <sup>4</sup> 元·人 <sup>-1</sup>	旅游总收入/旅游从业人员数量	+
	协调发展	旅游产业地位( $X_{28}$ )/%	旅游总收入/GDP	+
		旅游产业结构高级化( $X_{29}$ )/%	二、三产业比重/GDP占旅游总收入比重	+
		旅游产业结构合理化( $X_{30}$ )/%	旅游总收入/第三产业增加值	+
		旅游产业聚集度( $X_{31}$ )/%	旅游收入占GDP比重/中国旅游收入占GDP比重	+
	绿色发展	自然保护区面积占比( $X_{32}$ )/%	自然保护区面积/辖区面积	+
		森林覆盖率( $X_{33}$ )/%	森林覆盖率	+
		旅游业废气排放量( $X_{34}$ )/10 <sup>4</sup> t	旅游交通、住宿和旅游活动碳排放总量	-
	开放发展	旅游资源丰度( $X_{35}$ )/个·km <sup>-2</sup>	A级以上景区数量/区域面积	+
		接待服务能力( $X_{36}$ )/个·km <sup>-2</sup>	星级饭店、旅行社数量/区域面积	+
		旅游外汇占比( $X_{37}$ )/%	旅游外汇收入/旅游总收入	+
		入境游客人均花费( $X_{38}$ )/USD	旅游外汇收入/入境游客数量	+
	共享发展	客运量( $X_{39}$ )/10 <sup>4</sup> 人	公路、铁路和水运总量	+
		人均文化体育支出( $X_{40}$ )/元	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常住人口数量	+
		人均旅游收入( $X_{41}$ )/元	旅游总收入/常住人口数量	+
		艺术表演场馆演出场次( $X_{42}$ )/10 <sup>4</sup> 场	艺术表演场馆演出场次	+

注：“+”“-”分别表示正向、负向指标。

表2 新型城镇化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

Tab. 2 Classification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level between new urbanization and high-quality  
tourism development of tourism

等级划分	取值区间	等级划分	取值区间
极度失调	[0.0, 0.1)	勉强协调	[0.5, 0.6)
严重失调	[0.1, 0.2)	初级协调	[0.6, 0.7)
中度失调	[0.2, 0.3)	中级协调	[0.7, 0.8)
轻度失调	[0.3, 0.4)	良好协调	[0.8, 0.9)
濒临失调	[0.4, 0.5)	优质协调	[0.9,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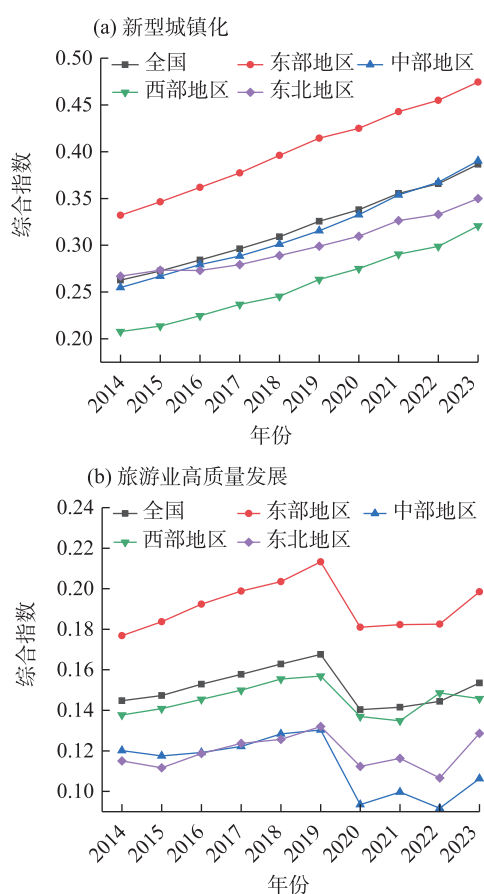


图2 2014—2023年中国新型城镇化与旅游业  
高质量发展时序变化

Fig. 2 Temporal evolution of new urbaniza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 China from 2014 to 2023

整、自然灾害及经济波动等复合压力时其发展轨迹与新型城镇化进程出现阶段性偏离。

## 2.2 新型城镇化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分析

全国及各地区新型城镇化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呈良好发展态势,除2020—2022年出现短暂下滑外,其余年份保持上升趋势

(图3)。从全国耦合协调度来看,2014—2015年处于濒临失调阶段,2016—2023年步入勉强协调阶段。近年来,随着中央与地方政府为新型城镇化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不断完善相关政策条例,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客观需求,使得两者发展环境日益改善,其耦合协调度显著提高。但分地区来看,中西部、东北地区耦合协调度长期与东部地区存在较大差距。由图4可知,2014年仅东部沿海的北京、上海、江苏达到中级或良好协调阶段,东北地区(黑龙江、吉林、辽宁)、中部地区(江西、安徽、湖南等)多省处于濒临失调阶段,西部地区(内蒙古、青海、重庆、西藏等)多省(自治区、直辖市)处于轻度或中度失调协调阶段;2017年东部地区北京、上海相继进入良好和优质协调阶段,中部地区多省提升至勉强协调阶段,西藏、青海、宁夏仍处于轻度和中度失调阶段;2020年北京和上海仍处于良好和优质协调阶段,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大多处于濒临失调或勉强协调阶段;2023年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迈入濒临失调及以上阶段。其中,中西部、东北地区省(自治区、直辖市)多处于濒临失调和勉强协调阶段,东部地区多省(直辖市)处于初级协调及以上阶段。总体而言,全国新型城镇化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表现为由东部沿海向中西部内陆地区逐级递减趋势,东部地区整体协调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东北地区。

## 2.3 障碍因子诊断

分别对2014—2023年中国及各地区新型城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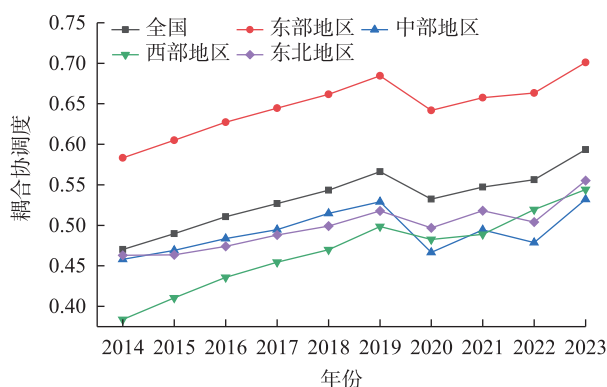


图3 2014—2023年中国新型城镇化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时序变化

Fig. 3 Temporal evolution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new urbaniza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 China from 2014 to 20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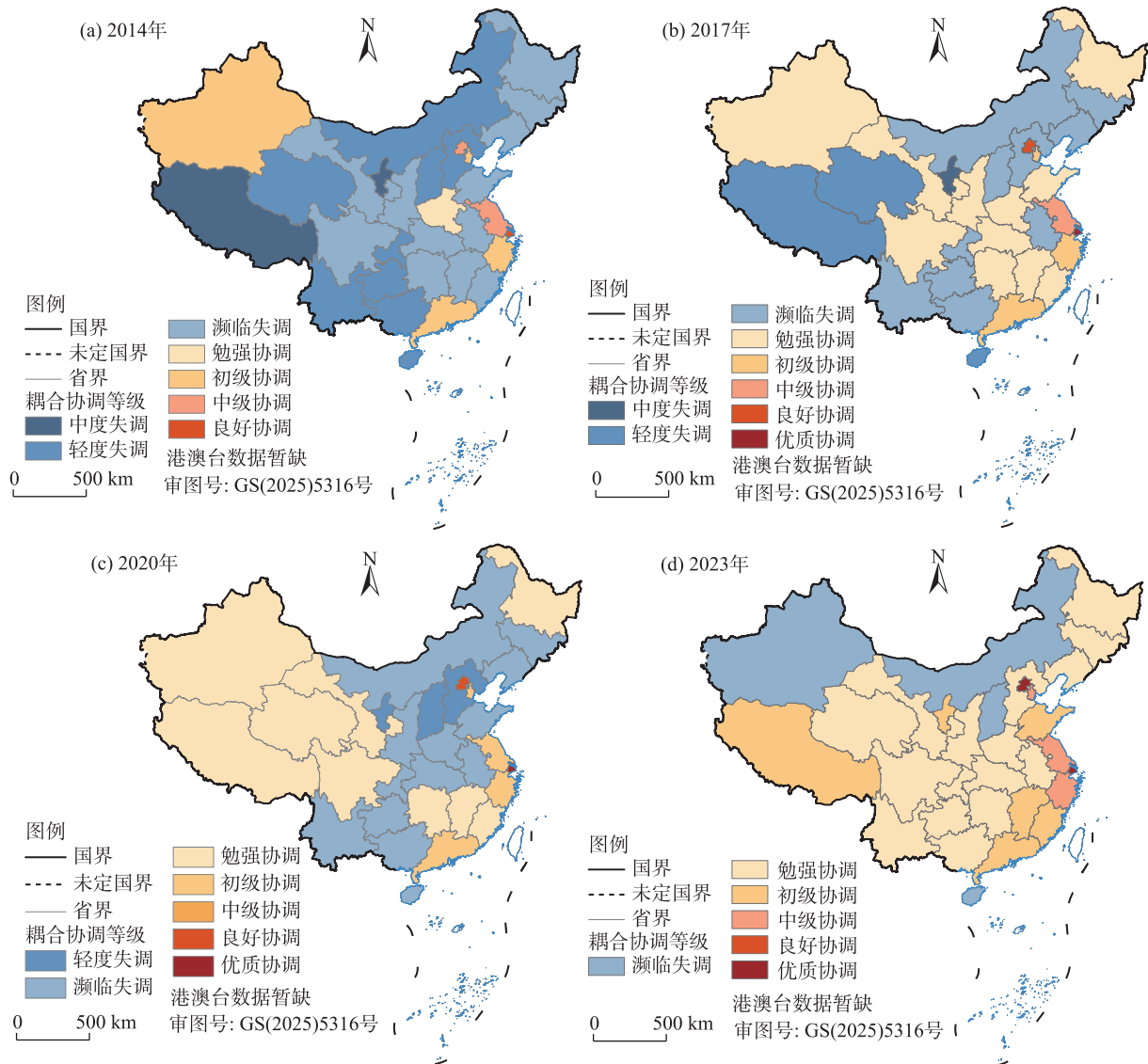


图4 2014—2023年中国新型城镇化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

Fig. 4 Spatial distributions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new urbaniza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 China from 2014 to 2023

化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2个系统进行阻力障碍因子诊断(表3)。在新型城镇化系统中,各准则层障碍度由大到小排序依次为: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生态城镇化>空间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城乡一体化。其中,经济城镇化虽是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首要障碍,但纵向来看其障碍度有所降低,反观社会和生态城镇化障碍度不断上升。这可能源于经济增长推动城镇化加速发展,但受制于产业结构转型滞后、公共服务供给失衡以及生态空间破坏等矛盾叠加,市民化质量不足与环境压力加剧,成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主要掣肘。对比而言,人口城镇化与城乡一体化得益于国家户籍制度改革与公共服

务延伸,其障碍度处于低位。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系统中,准则层障碍度排序为:开放发展>创新发展>共享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这表明旅游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破除新动能不足、开放水平受限与共享机制缺位等制约瓶颈,而协调、绿色发展则为行业可持续进步提供了坚实支撑。

选取前3障碍因子作为主要障碍因子进行分析(表4)。在新型城镇化系统中,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X_4$ )、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量( $X_{12}$ )、污水处理率( $X_{19}$ )构成主要障碍,表明区域经济发展动能与公共服务供给短板是阻碍新型城镇化建设提质的关键

表3 新型城镇化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准则层障碍度

Tab. 3 Obstacle degree at the criterion layer for new urbaniza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ourism

年份	新型城镇化						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经济城镇化	空间城镇化	社会城镇化	人口城镇化	生态城镇化	城乡一体化	创新发展	协调发展	绿色发展	开放发展	共享发展
2014	0.282	0.145	0.253	0.106	0.180	0.034	0.282	0.102	0.072	0.358	0.186
2015	0.275	0.145	0.256	0.108	0.182	0.034	0.295	0.085	0.059	0.377	0.185
2016	0.269	0.146	0.259	0.108	0.184	0.034	0.303	0.102	0.064	0.335	0.195
2017	0.266	0.146	0.260	0.109	0.185	0.035	0.293	0.100	0.066	0.368	0.173
2018	0.262	0.149	0.262	0.106	0.186	0.034	0.294	0.090	0.060	0.371	0.185
2019	0.259	0.15	0.265	0.105	0.189	0.033	0.292	0.096	0.058	0.376	0.178
2020	0.264	0.151	0.262	0.104	0.188	0.031	0.295	0.087	0.050	0.375	0.194
2021	0.262	0.156	0.259	0.104	0.189	0.030	0.298	0.072	0.052	0.389	0.189
2022	0.268	0.150	0.257	0.107	0.189	0.029	0.298	0.086	0.048	0.382	0.187
2023	0.265	0.143	0.262	0.109	0.193	0.029	0.303	0.099	0.058	0.346	0.193

表4 新型城镇化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指标层前三障碍因子及障碍度

Tab. 4 Top three obstacle factors and their obstacle degrees at the indicator layer for new urbaniza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ourism

省域	新型城镇化			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第一障碍因子	第二障碍因子	第三障碍因子	第一障碍因子	第二障碍因子	第三障碍因子
北京	$X_{19}(0.148)$	$X_{14}(0.134)$	$X_{10}(0.125)$	$X_{26}(0.190)$	$X_{37}(0.119)$	$X_{36}(0.099)$
天津	$X_{19}(0.151)$	$X_{10}(0.122)$	$X_{12}(0.107)$	$X_{26}(0.157)$	$X_{36}(0.140)$	$X_{37}(0.098)$
河北	$X_{12}(0.132)$	$X_{19}(0.111)$	$X_4(0.095)$	$X_{36}(0.140)$	$X_{26}(0.140)$	$X_{37}(0.092)$
山西	$X_{12}(0.119)$	$X_{19}(0.118)$	$X_4(0.091)$	$X_{36}(0.146)$	$X_{26}(0.144)$	$X_{37}(0.095)$
内蒙古	$X_{19}(0.122)$	$X_{12}(0.110)$	$X_{10}(0.84)$	$X_{36}(0.145)$	$X_{26}(0.141)$	$X_{37}(0.091)$
辽宁	$X_{12}(0.105)$	$X_{19}(0.095)$	$X_4(0.087)$	$X_{26}(0.146)$	$X_{36}(0.145)$	$X_{37}(0.095)$
吉林	$X_{19}(0.116)$	$X_{12}(0.108)$	$X_4(0.087)$	$X_{36}(0.151)$	$X_{26}(0.148)$	$X_{37}(0.097)$
黑龙江	$X_{12}(0.128)$	$X_{19}(0.121)$	$X_4(0.100)$	$X_{36}(0.145)$	$X_{26}(0.141)$	$X_{37}(0.092)$
上海	$X_{19}(0.148)$	$X_{10}(0.130)$	$X_{17}(0.087)$	$X_{26}(0.182)$	$X_{37}(0.106)$	$X_{42}(0.103)$
江苏	$X_{12}(0.133)$	$X_{14}(0.104)$	$X_{19}(0.079)$	$X_{36}(0.157)$	$X_{36}(0.147)$	$X_{37}(0.101)$
浙江	$X_{19}(0.109)$	$X_{12}(0.104)$	$X_{14}(0.096)$	$X_{36}(0.157)$	$X_{36}(0.147)$	$X_{37}(0.099)$
安徽	$X_{12}(0.129)$	$X_{19}(0.108)$	$X_4(0.090)$	$X_{36}(0.143)$	$X_{26}(0.143)$	$X_{37}(0.092)$
福建	$X_{19}(0.132)$	$X_{19}(0.116)$	$X_{10}(0.091)$	$X_{36}(0.147)$	$X_{26}(0.147)$	$X_{37}(0.089)$
江西	$X_{12}(0.128)$	$X_{19}(0.128)$	$X_4(0.095)$	$X_{36}(0.150)$	$X_{26}(0.148)$	$X_{37}(0.098)$
山东	$X_{12}(0.139)$	$X_{14}(0.102)$	$X_{19}(0.095)$	$X_{26}(0.143)$	$X_{36}(0.140)$	$X_{37}(0.092)$
河南	$X_{12}(0.148)$	$X_{19}(0.111)$	$X_4(0.102)$	$X_{36}(0.141)$	$X_{26}(0.140)$	$X_{37}(0.092)$
湖北	$X_{12}(0.125)$	$X_{19}(0.107)$	$X_4(0.082)$	$X_{36}(0.144)$	$X_{26}(0.143)$	$X_{37}(0.093)$
湖南	$X_{12}(0.130)$	$X_{19}(0.112)$	$X_4(0.091)$	$X_{36}(0.147)$	$X_{26}(0.145)$	$X_{37}(0.095)$
广东	$X_{12}(0.142)$	$X_4(0.092)$	$X_{17}(0.083)$	$X_{26}(0.149)$	$X_{36}(0.145)$	$X_{37}(0.088)$
广西	$X_{12}(0.115)$	$X_{19}(0.096)$	$X_4(0.093)$	$X_{36}(0.149)$	$X_{26}(0.147)$	$X_{37}(0.095)$
海南	$X_{19}(0.121)$	$X_{12}(0.112)$	$X_{10}(0.093)$	$X_{26}(0.142)$	$X_{36}(0.141)$	$X_{37}(0.090)$
重庆	$X_{12}(0.121)$	$X_{19}(0.120)$	$X_{14}(0.079)$	$X_{36}(0.144)$	$X_{26}(0.137)$	$X_{37}(0.091)$
四川	$X_{12}(0.130)$	$X_{19}(0.105)$	$X_4(0.093)$	$X_{36}(0.149)$	$X_{26}(0.145)$	$X_{37}(0.096)$
贵州	$X_{12}(0.117)$	$X_{19}(0.112)$	$X_4(0.091)$	$X_{36}(0.152)$	$X_{26}(0.149)$	$X_{37}(0.099)$
云南	$X_{12}(0.119)$	$X_{19}(0.115)$	$X_4(0.089)$	$X_{36}(0.150)$	$X_{26}(0.146)$	$X_{37}(0.094)$
西藏	$X_{19}(0.117)$	$X_{14}(0.104)$	$X_{10}(0.092)$	$X_{36}(0.162)$	$X_{26}(0.119)$	$X_{37}(0.101)$
陕西	$X_{12}(0.131)$	$X_{19}(0.124)$	$X_4(0.086)$	$X_{36}(0.147)$	$X_{26}(0.145)$	$X_{37}(0.093)$
甘肃	$X_{19}(0.119)$	$X_{12}(0.110)$	$X_4(0.094)$	$X_{36}(0.154)$	$X_{26}(0.150)$	$X_{37}(0.098)$
青海	$X_{19}(0.118)$	$X_{12}(0.097)$	$X_{10}(0.091)$	$X_{36}(0.146)$	$X_{26}(0.142)$	$X_{37}(0.093)$
宁夏	$X_{19}(0.127)$	$X_{10}(0.099)$	$X_{12}(0.096)$	$X_{36}(0.139)$	$X_{26}(0.136)$	$X_{37}(0.090)$
新疆	$X_{19}(0.120)$	$X_{12}(0.117)$	$X_4(0.087)$	$X_{36}(0.155)$	$X_{26}(0.150)$	$X_{37}(0.081)$

ChinaXiv:202605.00230v1



因素。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系统中,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旅游学生数量( $X_{26}$ )、接待服务能力( $X_{36}$ )、旅游外汇占比( $X_{37}$ )为主要障碍因子,反映出旅游人才供给与产业需求脱节、基础设施建设不足及国际旅游市场拓展乏力严重阻碍我国旅游业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进程。

#### 2.4 驱动因素识别

参考相关文献<sup>[3,11-13]</sup>,本文从经济、社会及政策3方面选取6个指标作为解释变量探测新型城镇化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的驱动因素(表5)。结果显示,仅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创新水平和政府干预能力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可能因为数据时间滞后性和跨区域空间异质性遮蔽了某些潜在显著关系,从而导致指标显著性较低。从显著指标解释力来看,经济发展水平(0.492)和政府干预能力(0.418)对其耦合协调度表现出较强驱动作用,而科技创新水平(0.260)相对有限。随着经济持续增长,居民对于美好生活需求愈发强烈,此类需求促使旅游产品和城镇公共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并深刻影响着新型城镇化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关系。新型城镇化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作为涵盖多维要素的两大复杂系统,需要统筹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其中,政府干预既是制定和落实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要抓手,也是引导和助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相较而言,科技创新水平的低解释力主要缘于我国旅游业仍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业覆盖面广、容量大,高素质旅游人才占比较低,加之科技创新水平转化为生产力周期长,具有一定滞后性,导致面板数据表现不突出。而当前我国旅游业正

处于转型关键期,旅游与科技深度融合在创新管理方式、提升游客体验和产业效率等方面展现出巨大潜力,正成为推动新型城镇化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能。

### 3 讨论

本文分析了我国新型城镇化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时空演进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新型城镇化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及耦合协调度总体呈上升态势,与既有研究结论相符<sup>[8,10]</sup>。但在高质量发展导向下,两大系统耦合协调等级仍处于较低水平,区域异质性较以往研究更为显著<sup>[13]</sup>,表明在“规模扩张”转向“质量共生”过程中,尚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质效协同,该结构性矛盾与地区经济基础、社会环境及政策制度等密切相关。由此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强化区域联动,积极对接国家区域重大战略,突出东部地区的示范引领作用,系统构建跨区域“城旅”协同创新走廊,促进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高效流动与整合共享;二是推动差异化发展,东部地区应聚焦国际市场开拓与技术创新赋能,中部地区强化交通枢纽与文化节点建设、推进产业集群化发展,西部地区立足生态、文化与边境资源,推动生态旅游与文化遗产深度融合,形成特色鲜明、梯度协调的区域格局;三是深化质效协同,依托新型城镇化产业筛选机制,重点培育康养、工业、研学等特色业态,打造功能嵌套、价值共生的“城旅”融合新形态,驱动产业结构优化与发展动能转换。

### 4 结论

(1) 2014—2023年新型城镇化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呈现增长态势,且部分时期具有非对称耦合特征,但囿于旅游业高敏感性,2019—2022年发展轨迹存在偏离。

(2) 新型城镇化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波动上升,但地域间差异较大,具体表现为东部沿海向中西部内陆逐级递减分布格局。

(3) 内部障碍因子中,经济城镇化与旅游创新发展居于准则层首位,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前3障碍因子依次为人均GDP、人均公共图书馆藏量、

表5 新型城镇化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耦合协调驱动因素

Tab. 5 Driving factors for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new urbaniza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ourism

指标名称	指标说明	q 值
经济发展水平/ $10^4$ 元	地区生产总值	0.492*
科技创新水平/%	R&D 项目经费投入强度	0.260*
人力资本水平/a	平均受教育年限	0.178
对外开放程度/ $10^4$ USD	进出口贸易总额/地区生产总值	0.329
政府干预能力/%	财政支出/地区生产总值	0.418*
交通条件/ $\text{km} \cdot \text{km}^{-2}$	路网密度	0.273

注:\*表示在0.1水平上显著;q为影响因素解释力度。



污水处理率以及旅游学生数量、接待服务能力、旅游外汇占比。

(4) 外部驱动因素中,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干预能力对两大系统耦合协调度的解释力最为突出,科技创新水平解释力相对有限。

##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李志飞, 曹珍珠. 旅游引导的新型城镇化: 一个多维度的中外比较研究[J]. 旅游学刊, 2015, 30(7): 16–25. [Li Zhifei, Cao Zhenzhu. Tourism-oriented new urbanization: A multi-dimensional comparative study[J]. Tourism Tribune, 2015, 30(7): 16–25. ]
- [2] 蔡刚. 旅游产业对新型城镇化影响的实证分析[J]. 统计与决策, 2018, 34(17): 102–104. [Cai Gang.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tourism industry on new urbanization[J]. Statistics and Decision, 2018, 34(17): 102–104. ]
- [3] Yu J, Safarov B, Wang C, et al. The effect of transportation networks on heritage tourism and new urbanization: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rich heritage sites in a Chinese province[J]. Heritage, 2023, 6(12): 7293–7315.
- [4] 赵磊, 李诗琪, 康敏. 旅游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动态新型城镇化门限效应[J]. 旅游学刊, 2024, 39(10): 31–48. [Zhao Lei, Li Shiqi, Kang Min. The dynamic new urbanization threshold effect of tourism development on China's economic growth[J]. Tourism Tribune, 2024, 39(10): 31–48. ]
- [5] Hao M, Li G, Chen C Y, et al. A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new-type urbanization and tourism resource conversion efficiency: A case study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in China[J]. Sustainability, 2022, 14(21): 14007, doi: 10.3390/su142114007.
- [6] 王兆峰, 汪倩. 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对旅游业碳排放的门槛效应研究[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22, 31(1): 13–24. [Wang Zhaofeng, Wang Qian. Threshold effect of new urbanization on tourism carbon emission in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J].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n the Yangtze Basin, 2022, 31(1): 13–24. ]
- [7] 杨主泉. 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协同发展机理研究[J]. 社会科学家, 2018(10): 85–90. [Yang Zhuquan. Research o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mechanism of tourism and new urbanization[J]. Social Scientist, 2018(10): 85–90. ]
- [8] 赵磊, 潘婷婷, 方成, 等. 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基于系统耦合协调视角[J]. 旅游学刊, 2020, 35(1): 14–31. [Zhao Lei, Pan Tingting, Fang Cheng, et al. Tourism industry and new urbanization: A view based on system coupling perspective[J]. Tourism Tribune, 2020, 35(1): 14–31. ]
- [9] 王生霞, 李茂兰, 刘芮廷. 旅游业效率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变及障碍因素分析——以“一带一路”核心段为例[J]. 干旱区地理, 2025, 48(11): 1–13. [Wang Shengxia, Li Maolan, Liu Ruiting.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and obstacle factors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tourism efficiency and urbanization: A case of the core se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J]. Arid Land Geography, 2025, 48(11): 1–13. ]
- [10] 王金伟, 王启翔, 陆大道. 数字经济、旅游经济与新型城镇化时空耦合格局及影响因素——以长三角地区为例[J]. 地理研究, 2024, 43(12): 3301–3326. [Wang Jinwei, Wang Qixiang, Lu Dadao. Spatio-temporal coupling pattern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of digital economy, tourism economy and new urbanization: A case study of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4, 43(12): 3301–3326. ]
- [11] 贺小荣, 夏凡, 彭坤杰. 新型城镇化与旅游产业协同发展的时空演化及驱动因素——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J]. 现代城市研究, 2022(10): 73–80, 87. [He Xiaorong, Xia Fan, Peng Kunjie. Spatial and temporal evolution and driving factors of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of new urbanization and tourism industry: A case study of Yangtze River Delta city cluster[J]. Journal of Modern Urban Research, 2022(10): 73–80, 87. ]
- [12] 闫明月, 闫明涛, 张野, 等. 中国市域旅游高质量发展格局演化与影响因素[J]. 经济地理, 2024, 44(12): 206–217. [Yan Mingyue, Yan Mingtao, Zhang Ye, et al. Pattern evolu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high-quality tourism development in urban areas of China[J]. Economic Geography, 2024, 44(12): 206–217. ]
- [13] 邵海琴, 吴卫, 王兆峰. 长江经济带旅游资源绿色利用效率与新型城镇化的时空耦合协调[J]. 经济地理, 2021, 41(8): 204–213. [Shao Haiqin, Wu Wei, Wang Zhaofeng. Temporal and spatial coupling coordination of green utilization efficiency of tourism resources and new urbaniza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J]. Economic Geography, 2021, 41(8): 204–213. ]
- [14] 刘天翌, 刘沛林, 王良健.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古村镇保护与旅游发展路径选择——以萱洲古镇为例[J]. 地理研究, 2019, 38(1): 133–145. [Liu Tiancao, Liu Peilin, Wang Liangjian. The protection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path of ancient villages and old town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type urbanization: A case study of old town of Xuanzhou in Hunan Province[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9, 38(1): 133–145. ]
- [15] 王凯, 林惠. 新型城镇化对旅游扶贫效率的影响研究——以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八个国家级贫困县为例[J]. 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38(3): 56–63. [Wang Kai, Lin Hui.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new-type urbanization on the efficiency of pro-poor tourism: A case study of 8 national-level poor counties in Enshi Autonomous Prefecture[J]. 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0, 38(3): 56–63. ]
- [16] Fang L Q, Liu Z H, Jin C Y. How does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affect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new urbanization[J]. Sustainability, 2023, 15(14): 10824, doi:

10.3390/su151410824.

- [17] 赵磊, 陈衍, 刘颖. 旅游业、新型城镇化与经济增长[J]. 旅游科学, 2022, 36(6): 20–44. [Zhao Lei, Chen Yan, Liu Ying. Tourism, new urban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J]. Tourism Science, 2022, 36(6): 20–44. ]
- [18] Zhang G H, Xing L. Research on tourism economic effect under the threshold of new-type urbanization in coastal cities of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J]. Ocean & Coastal Management, 2023, 239: 106587, doi: 10.1016/j.ocecoaman.2023.106587.
- [19] Romao J, Neuts B. Territorial capital, smart tourism specialization and sustainable regional development: Experiences from Europe [J].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17, 68: 64–74.
- [20] 刘佳, 李煜轩. 低碳城市建设与旅游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276个地级以上城市的准自然实验[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4, 45(6): 38–55. [Liu Jia, Li Yuxuan. Low carbon city construction and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tourism industry: A ouasi natural experiment based on 276 prefecture level and above cities[J]. Journal of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4, 45(6): 38–55. ]
- [21] 黄泰, 卫嫚, 席建超. 长三角乡村旅游典型县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共同富裕的共生演进的实证分析[J]. 经济地理, 2024, 44(6): 213–223. [Huang Tai, Wei Man, Xi Jianchao. Symbiotic evolution between new-type urbanization and rural common prosperity in typical counties of rural tourism in Yangtze River Delta[J]. Economic Geography, 2024, 44(6): 213–223. ]
- [22] 刘沛林. 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留住乡愁”的理论与实践探索[J]. 地理研究, 2015, 34(7): 1205–1212. [Liu Peili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exploration of “remembering nostalgia”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urbanization[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5, 34(7): 1205–1212. ]
- [23] 陈菲菲, 赵静, 高科佳. 乡村旅游发展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基于新型城镇化的中介效应[J]. 商业经济研究, 2024 (17): 95–98. [Chen Feifei, Zhao Jing, Gao Kejia.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on the consumption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China: The mediation effect based on new urbanization[J]. Journal of Business Economics, 2024(17): 95–98. ]
- [24] 徐雪. 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多维测度、空间差异及动态演进[J]. 统计与决策, 2024, 40(10): 100–105. [Xu Xue. Multi-dimensional measurement, spatial difference and dynamic evolution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new urbanization[J]. Statistics and Decision, 2024, 40(10): 100–105. ]
- [25] 孙晓, 刘力钢, 演克武, 等. 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和区域差异分析[J]. 统计与决策, 2022, 38(19): 92–97. [Sun Xiao, Liu Ligang, Yan Kewu, et al. Measurement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level of tourism industry and analysis of regional differences[J]. Statistics and Decision, 2022, 38(19): 92–97. ]
- [26] 王劲峰, 徐成东. 地理探测器: 原理与展望[J]. 地理学报, 2017, 72(1): 116–134. [Wang Jinfeng, Xu Chengdong. Geodetector: Principle and prospective[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7, 72(1): 116–134. ]

## Coupling coordination, obstacle diagnosis and driving factors of new urbaniza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 China

LYU Wanqing, SONG Zhigao, XIAO Zhaofu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and Tourism Management,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Yunnan, China)

**Abstract:** Investigating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new urbaniza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s crucial to the steady advancement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Building on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mechanism between new urbaniza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ourism, this study utilizes provincial panel data on China from 2014 to 2023 and employs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the obstacle degree model, and the geodetector to analyze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bstacle factors, and driving forces of their relationship.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From 2014 to 2023, the levels of both new urbaniza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ourism exhibited a significant overall upward trend, and their evolutionary trajectories demonstrated high consistency from 2014 to 2019. (2)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the two systems experienced a volatile rise, characterized by substantial regional differences that formed a decreasing spatial pattern from the eastern coast to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inland regions. (3) Regarding the obstacle factors, economic urbanization and tourism innovation development were the primary obstacles at the criterion layer for the new urbanization system and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ystem of tourism, respectively. At the indicator layer, GDP per capita and the number of tourism students were the core obstacles. (4) Among the driving factors,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capacity for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had the strongest explanatory power for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whereas the influenc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was relatively limited.

**Keywords:** new urbanizati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ourism; coupling coordination; obstacle degree model; geodetector